

大规模推广村村修志的必要性与成功路径*

钱茂伟 王笑航

提 要：从地方志角度来看，“一村一志”是地方志发展下延到村一级的必然形态。从公众史学的角度来看，每个村庄的历史都值得记录。修编村志是新中国地方志编修的最大创新所在，村村修志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由广州天河区、青岛崂山区、上海金山区等地的实践经验可知，地方政府是实现大规模村志编修的基本动力所在，以县区为单位、以项目形态开展“村村修志”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政府主办，地方史志部门承办，高校学者助力，广大村民参与，是村村修志的特点。要解决诸多落后观念问题，让村志编修入法，列入地方五年规划，且设置编纂平台，才有可能实现大规模修村志活动。

关键词：村志 村村修志 公众史学 乡村振兴

近20年来，广州天河区、青岛崂山区、上海金山区等地进行了“一村一志”全覆盖式的修志实践，规模效应显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推动的“中国名村志”项目，实现了全国性粗线条的全覆盖，即覆盖到全国的名村，这是传统意义上的重点乡村修志。从全国范围来看，绝大多数村庄还是没有自己的村志，局部的村村修志成功实践能否进一步推广为全省性甚至全国性的村村修志活动？“中国名村志”能否进一步扩充为“中国村志”呢？村村修志，何以必要？何以可能？黄建安《论“村落终结”时代的村志编纂》^①初步给予了回答，仍可进一步细化讨论。他的文章重在理论上的说明，笔者想通过已有的村村修志试点实践及经验的梳理作更深入的讨论。村村修志，在全国部分区县市的试点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执行中的相关困难也是可以解决的。目前学界对此实践活动的系统考察不足，虽有局部地区的经验总结^②，但没有思考过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局部的村村修志成功实践是否可进一步推广为全省性甚至全国性的村村修志？这是值得讨论的。笔者从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角度关注村志编修工作，希望将实践活动及相关成功经验总结提炼出来，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

一 大规模推广村村修志的必要性

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到现在已经过了30多年，中国各地的村志编修完成了个案化、点状式发展阶段，村村修志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块状式试点阶段，未来应进入村村修志全面推广阶段。正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一样，笔者认为，村村修志也是乡村志编修的奋斗目标。近年来，提倡村村修志的呼声越来越多，譬如2018年2月，浙江市民袁先生提出“希望村村都能编修村志，将村志的精髓和底蕴体现在文化礼堂内”^③。2018年5月，笔者曾向浙江省

* 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ZAD194）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黄建安：《论“村落终结”时代的村志编纂》，《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2期。

② 参见靖婧：《略谈村志的编修——以〈天河区村志系列丛书〉为例》，《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4期；朱永平：《江苏张家港市村志编纂调查》，《广西地方志》2018年第1期。

③ 陈静珠：《建议村村都编修村志》，宁海新闻网2018年2月4日，<http://nh.cnnb.com.cn/system/2018/02/04/011662467.shtml>，2020年8月5日。

领导建议,用村史、村谱、村民口述史3个项目丰富文化礼堂建设内涵。^①2018年4月公布的《上海市乡镇街道村志及专业志编纂规划(2017—2025)》提出“全覆盖”理念;2018年6月,北京也提出了至2020年“所有行政村实现地方志工作全覆盖”目标。可见“全覆盖”已逐步成为大家共同的目标追求。只是“全覆盖”程度会有不同,北京是低标准的名村志全覆盖,上海则是局部区县全覆盖(只有金山区实现了,其他区没有实现)。

为什么要大规模提倡并推广村村修志呢?从村志发展形态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志编撰由名村到村村,由合卷到独卷是其发展规律,当名村简志无法承载更多信息量时,村村详志便呼之欲出,而村村详志的普及推广必然发展到村村修志形态,故而村村修志是村志编撰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村志编撰的必然结果。

更为详细地说,之所以要村村修志,有下面4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村志编修制度化是新中国方志事业的创新所在。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村庄在大量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在不断地离开,最后一代传统农民将彻底消失。黄建安认为,在“村落终结时代”,“真实记录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为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村庄留下永久的文化记忆,是时代赋予方志人的历史使命”^②。虽然目前有二三千个村修了史志,但全国范围来看,绝大部分村仍处于“有村无志”状态,所以村村修志的必要性相当强。

一是每个村都有独立的历史书写需求。为什么每个村都值得书写?因为每个村都是独立的空间实体,有其发展过程与特点,它的过往历程及故事都值得记录下来,不是只有部分名村有资格修志。村志是村庄历史存在的文本载体,特定的村志服务于特定空间的村民。就横向关系来说,不同村的村志彼此之间无法替代,合卷式村志具体到每个村也只能以简志的形态呈现,难以收录更多村民的历史。唯有村村修志,方能充分记录村民历史,讲好乡村故事。二是村村修志可以实现村志编纂空间布局的平衡化。为什么要全面修志而非重点修志?这涉及均衡建设机制,村史编纂空间布局的平衡化。当代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走的是重点建设时代,通过榜样带动周边。修志也是如此,过了个别化重点建设时代,现在进入科学均衡发展时代,我们要认识到名村修志并不是村志编修的最终目标,名村修志是村志编修的第一步,唯有将名村修志普及化,实现村村修志,才可满足各村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三是乡村历史记录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乡村持久的历史文化建设。现在乡村普遍没有建档、修志制度,这造成的乡村记忆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故而编修村志是乡村历史文化止血、保底的制度建设。村志编修是一项抢救性工作,刻不容缓。通过建立健全村村建档、村村修志制度,可以解决未修志行政村所面临的“由无而有”的万事开头难问题。省市县三级修志是传统编修活动的延续,乡村志编修才是创新。《上海市乡镇街道村志及专业志编纂规划(2017—2025)》已经率先提出“乡镇街道村志及专业志一般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这套制度值得全国推广。只有建立密而不疏的机制,才能做好基层乡村文化建设工作。

其二是公众历史本位的要求。公众史学之所以要关注村史,是因为它被列入社区史典范来思考的。因为,行政村在性质上是村民自治组织,村的历史,既是村组织管理史,更是全体村民活动史。在大时代背景下,村民如何生存与发展,是村史演变的主线。在以人为本位的公众历史体系下,村是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是每个人直接生活的社区,每个人都在村这个社区中成长。以村为单位,可以将所有村人的过往记录下来。村村修志的底层文化建设,最能体现社会本位、公众

① 2018年5月,《宁大社科资政》2018年第2期《乡村文化记忆提炼:浙江文化礼堂建设版本升级之道》得到浙江省副省长成岳冲的肯定性批示。

② 黄建安:《论“村落终结”时代的村志编纂》,《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2期。

本位精神。

其三是全国一盘棋历史文化建设的需要。村村修志为什么要政府出面组织？没有政府组织，村志编修实现不了全国性规模效应。政府之所以要大规模推广村村修志，一则是回归为人民服务原则。地方官员为政做事，要以人民利益为核心，这是检验一切工作的基本原则所在。村村修志体现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则中国政府有能力做到村村修志。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世界领先，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村村修志可以最大程度地平衡各地历史记录不均衡问题，只要政府重视，下定决心做，完全可以做到。

其四是乡村历史文化脱贫的需要。行政村是中国最为基层的组织，历史文化贫困是普遍现象。摆脱了经济贫困的乡村，建起了现代化的新楼，然而仍存在严重的历史文化贫困问题，缺乏乡村历史文化的积累。村委里没有档案、没有图书是普遍的现象。村村修志是乡村文化建设最可操作的抓手，可以实现文化服务的全覆盖。从社区文化营造角度来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乡村历史文化建设工程，将凝聚人心、汇总资源，建设过程与建设结果双向重要。山东省保密局马林担任马圈村第一书记负责脱贫攻坚时，认识到编撰村志的重要性，认为村志编撰与扶贫兴村相结合收效明显。^①从宏观角度看，村村修志的结果将是村志数量的成倍增加。一旦全国实现村村修志目标，将会有50万部以上村志面世，这是空前的地方志编修成绩。通过村村修志，有助于中央政府进一步了解乡村发展状况，村志编修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会激发村民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村村修志也会大大促进乡村文化人才建设，以每志编修队伍核心5人计算，会培养出250万核心人才。参与口述活动的人更多，以每书平均100人计算，会让5000万老干部、老教师、老农民的历史记忆派上用场。这是乡村历史文化资源的充分释放与利用，是基层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是真正的乡村文化振兴。村志编修全覆盖将彻底改变乡村历史建设空白局面。正如全国脱贫攻坚是首次，全国乡村历史文化脱贫也是首次，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文化建设规模化优势。

二 区县村村修志试点的成功经验

从广州天河区、青岛崂山区、上海金山区等地的修志实践可看出，以区级、地级为单位，“村村修志”“一村一志”全覆盖式修志是可以做到的。这些地方的村村修志之所以会成功，可归结为三个原因：领导决策、项目形态、有效执行。

第一，领导科学决策是关键。“村村修志”“一村一志”全覆盖式村村修志是大型文化活动，工作量大，没有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难以成功。要获得广泛支持的关键是决策层的科学决策。决策层达成共识，最为关键。从现有成功案例来看，多是地方史志办公室提出建议，引起政府领导重视，进而批复执行。2007年，青岛市崂山区史志办公室提出《关于开展“村村修志”工程的建议》，并多次向领导汇报，该建议得到了区委书记的批准，于是该项工作全面启动。2010年，上海金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经研究，向区委提出在金山区全面启动村志编纂工作请示，被区委、区政府采纳，村志编纂工作被列为金山区档案方志事业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工作之一，随后全面展开。2011年，江苏省丹阳市由史志办经调研后提出报告，市委书记批示后由市委、市政府、史志办三方发文，随后工作得以开展。因政府批准，得以“五个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史志办提出方案，县政府协调解决人员、经费、办公场所等。由此可见，村村修志成功案例中，一般是由史志办系统调研提出方案，上报党委或政

^① 参见马林：《编撰村志助力扶贫兴村》，《保密工作》2020年第2期。

府,获得批示,决策科学,各方配合默契,故而能够成功。

第二,项目推广最理想。所谓项目形态,就是将编修村志列入固定项目,有了项目,就有了稳定的执行机构、资金来源,这种模式的规模效应十分明显,用大型项目是比较理想的,因为政府的经费预算正是如此运作的。如果一项活动能证明对人民有利,通过政协提案,政府领导是会同意批复的,镇村二级领导也是会全力支持的。一旦政府发文,有了承办单位,再进一步让人员培训、模版选用跟上,就可以实现目标。这种模式最为靠谱,如能推广,当成大气候。《丹阳村村志记忆》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值得推广。整个项目计划5年完成,预算250万元经费,分14卷。广州天河区编“天河村志系列丛书”缘起于区政协会议的提案,获得区政府支持后,区政府下文交给区志办负责,随后连续5年写入《天河区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天河村志系列丛书”取得成果的关键。“政府每年安排经费投入。如拨出专项经费聘请专家,出版经费补助每村2万元。历届区长纷纷为村志作序。副区长、政府办主任参加村志培训班,作动员报告。”^① 崂山区村志编修亦有“村村修志工程”作为支撑,区人民政府专门成立崂山区“村村修志”工程领导小组,拨出专款216万元,而且将139个村级修志工作纳入全区文明考核之列。上海金山区更为明显,金山区村志编修计划得到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后,直接被列入金山区档案方志事业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工作。由此可见,将编修村志尤其是“村村修志”列为专项项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是修志成功的基本保障。

第三,有效执行见成效。项目批准以后,就要靠史志办有效的组织与管理来执行了。天河区是由区志办来负责执行,接到任务后,区志办组织区属各行政村编写人员进行培训,此后明确编写步骤,对村志编撰进行具体指导,参与具体的工作。青岛崂山区的“村村修志”也是由区志办执行,在业务指导和业务规范上下大力气,每年进行一次集中培训,还分街道、村庄、专题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强化督导,成立专家组集中巡回审稿指导,定期督通报,保障了“村村修志”的进行。金山区的经验是:由点到面,有计划推开;建立机构,有组织推行;培训指导,有针对解决;调研推进,有步骤实施;立足实践,有实效推广;强化督查,有力度落实;各司其职,开展评审验收。^②《临朐村镇志略》的经验是4句话:“领导支持是前提,配好人员是保证,狠抓质量是关键,开发利用是目的。”^③ 张家港市的经验是:“一是统一思想抓发动,激发‘我要修,主动修’的内生力。二是抓住关键善启动,解决‘谁来修,怎么修’的开头难。三是悉心指导促联动,营造‘修良志,彰特色’的好氛围。四是突出考核强推动,建立‘明时序、重保障’的新机制。”^④ 天河、崂山、丹阳、临朐、金山等地的经验表明,以区县为单位村村修志是可行的。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进行,乡村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乡村文化振兴却依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村村修志的难处,主要是缺乏人才与经费,其次在于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结合实践经验,看下村志编纂大面积推广中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1. 经费筹集。全覆盖式村志编修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事,不能不谈经费问题。广州

① 韦韩韞、柳玉秀:《学习广东经验 做好方志工作》,《广西地方志》2014年第4期。

② 参见王鑫:《地方志·乡土情——上海市金山区“一村一志”纪实》,《乡镇论坛》2019年第24期。

③ 刘建国:《村镇志编修的实践和体会》,山东省情网2015年1月27日, <http://www.sdsqw.cn/articles/ch00304/201501/EDB9C65E-6861-4B36-BDFC-DF937C4E9DDA.shtml>, 2020年8月1日。

④ 张家港市地方志办公室:《张家港市在全省名镇名村志编纂工作启动大会上作经验交流》,苏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网2017年1月5日, <http://dfzb.suzhou.gov.cn/dfzb/xszl/201701/b7f04234f33b4e458de02302fe4508b1.shtml>, 2020年8月1日。

天河区除政府拨款补助外,资金主要由各村民委员会自筹。青岛崂山区在资金问题上采取多方筹资的办法,采取村集体自筹一点、办事处扶持一点、区政府补助一点、社会赞助一点的方式解决。区政府补助政策出台后,街道办事处按照1:1比例,相应制定村志配套补助政策,社区发动村内民营企业捐资助修,基本满足修志资金。上海金山区则将村志编修纳入政府工作与考核体系,将修志所耗资金纳入各镇年度财政预算。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村志编修经费的筹集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大项目形式列入县镇村三级政府财政预算中。经费问题核心要走预算之路,得在财政预算上做文章。很多地方经常感叹修志缺乏经费,事实上问题的关键是修志费用没有纳入财政预算。村志经费可分编修费与出版费。一些地区的村志编修是完全义务的,义务工作当然很好,但从长远角度看,大规模推行村村修志还是需要经费投入,要向修志人员发放补贴。二是筹集企业与社会人员的资金。用众筹模式让人人捐赠,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所在。一些村已经这么做了,证明是可行的。此外,可将经费分为前期与后期两部分,前期编修费由村里出,后期出版费由县镇出。

2. 队伍建设。应以地方史志部门为核心,主要从领导队伍建设、编修团队建设与修志人才培养三方面入手发力,建设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执行力的修志队伍。

首先,要建立三级领导队伍。县志办承担督促、组织培训。县志办方志科管理干部不足问题也可以解决,可以在每一个乡镇建立一个办公室,由相关人员兼任。如此,村史管理队伍也可解决。金山成立区、镇、村三级领导机构,层层分解,落实责任,确保村志编纂有序推进。这个经验值得推广。中间要有一个联系机制,不是简单的文件、会议可以解决的。

其次,要建设一支编修团队。村村修志需要大量修志人才,可以借此机会,在乡村建设一支修志队伍。广州天河区是由区志办领导,下辖各行政村负责组织编撰队伍,区志办给予培训与指导;青岛崂山区也是区史志部门进行领导督导,区县级地方史志部门是编修队伍的中坚力量。乡村也有一定的人才基础,村中退休干部、老师、知识分子可以纳入修志队伍,村中大学生群体也不可忽视,可以通过培训,建立一支来自不同行业、老中青结合的村史修史队伍,还可在村民中建立志愿者队伍作为辅助。更重要的是从公众史学角度出发,人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人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记录者,村村修志最重要的作者群体还是广大村民。村村修志的队伍建设要注意专业队伍与志愿者相结合的模式,专业队伍是以史志办人员、知识分子为核心的骨干力量,志愿者则面向广大村民招募,工作时间更灵活,通过专业队伍与志愿团队的共同合作来实现村志编撰。

再次,关于修史人才的培养,可通过县镇二级史志办来组织轮训。可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化培训模式,定期开班宣讲相关知识,亦可通过线上视频会议,网上交流,各村同步展开培训。修志队伍的组织模式也要调整,目前普遍是组织老人来修志,老人多采用传统手写方式来修志,效率不高。笔者建议可让懂电脑写作的中青年承担主编之职,老人负责提供村史资源,大学生承担采访任务,将采访所得资料整理为电子文本。村史不是国史,时空范围比较小,目前村志编修的时空范围多在近几十年,过往记忆多存于中老年人的大脑之中,完全具备村志编纂信息库要求。

3. 村志模版多样化。从目前的试点来看,在村村修志理念下,让各村首次拥有了村志,这是值得肯定的事。不过由于可选的村志模版过少,导致“百村一面”,出现体例单一僵化的问题,许多人以为方志就只有一种横排竖写模式。目前的村志之所以套用县志,是因为没有可参考的村志样版,古村志不用,新村志见得少。要解决“百村一面”问题,须提供多样化的模版选择。村志的本质是记录当代村庄历史、村民历史,所以至少可以是村志,也可以是村史。村志与村史,不是只有一种,完全可以多样化。村志应转换性质,由单一的组织本位而组织、公众双本

位模式，记录更多的村人历史。某些人主张限制别人的多样化探索、多样化出版，这是不可取的。村谱编修，要与口述家史结合起来，就可成为全新的乡村家族史。这样，公众社区史的色彩越强。从学术史回顾来看，更重视村志模式的创新。

4. 从口述史入手搜集材料。谈及编书，人们马上想到寻找相关文本资料。但是很多村庄由于缺乏历史文本的书写积淀，信息资料有限，不足以支撑起写一部村史，故而可能有人认为村村修志不可能实现。其实，站在公众史学的角度来看，编修村志除了参考相关的档案文本外，更要重视当代村民的历史。“村民，作为村庄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无疑是在村庄变迁中最有发言权的。一个个村庄的历史，绝不仅仅存在于封存的档案、资料中，更是存活于那些亲历者、当事人、目击者的记忆中。”^① 通过口述史方式，发掘群众大脑中的过往记忆，就能解决信息不足问题，故而正确的路径是口述史采访与文本档案搜集并举，口述史采访在先，档案材料搜集可稍后。口述史采访要急，因为时间不等人。档案已在，不会丢失。进入编修阶段，先急后慢，半年之内，将老人的记忆先抢救下来。从口述史入手，是一个最容易操作的路径。口述史采访，稍加训练，就可上路。先拍照、录像、录音、扫描，成村史资料长编，也是一种办法。由口述史采访入手，也可杜绝村志编修中容易出现的抄袭现象。村人不懂如何搜集材料，以为找材料就是摘抄已刊图书中的第二手资料，结果出现抄袭的现象。

5. 优化做事原则与流程。如何做大型项目？笔者的经验是五原则：趁热打铁、先急后慢、先易后难、日积月累、精益求精。具体地说，要注意以下事项：

首先，把编修与正式出版分开。前期筹备、编修工作要快，迅速进入状态，形成初稿，避免拖沓，完成初稿后则要慢，不能急于出版。质量的提高离不开积淀，人才有一个培训过程，材料有一个扩充过程，信息有进一步补充过程。譬如“金山区村志丛书”，先内部印出来，然后反复打磨修改，进一步提升质量，最后公开出版。其次，人才培养可分批次。口述史人才培养要早，要引入各村大学生力量，让他们在假期或节假日参与进来。甚至可建立村志编修微信群，面向社会招募临时志愿者，让更多热心人士参与进来。高校力量加入进来，以研代训，也是好办法。再次，修志队伍要动态化调整。修志重在得人，县镇村三级力量要介入编修队伍的组织。修志队伍要有一种自我更新机制，有一个实践考察机制。主编的责任心是保证村志效率与质量的关键，正如《内黄县乡镇村志》主编史其显所说：“非有正确认识、目的明确的热心家不可，把单纯的任务观点变成对历史对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精神。”^② 一旦发现主编不理想，要及时换人，找肯干事、组织力、执行力强的人担纲。

6. 严格执行流程化管理。村村修志同步推开以后，普遍反映各镇各村的进度不一。因为每个村领导班子重视程度不同，修史队伍熟悉程度也不同。要让人员熟练进入修志状态，必须有村志操作手册来指导。操作路径不当，是导致村志编修出问题的原因所在。如何提炼出更为靠谱的村志编纂流程，是值得学人研究的。编修进度的督促，一靠行政检查，修志是经过党委、政府批准的重大规划，列入行政执法检查之列，这对三级史志办有督促作用。二靠奖励制度，张家港市的经验是“以奖代补”，按期完成，给予奖励；过了时间点，拿不到奖励。最后，要制定质量验收标准。

① 甘正富、尹少鹏：《吾民讲吾村 乡音叙乡村——村庄口述史“吾村吾民”项目实施报告》，《江苏地方志》2020年第4期。

② 史其显主编：《内黄县乡镇村志·编者的话》，《内黄县乡镇村志·东庄镇卷》（内部印刷），第3页。

三 村村修志普及推广的难处与解决办法

目前,村村修志在全国共有10个地级市、109个区县试点成功案例,但全国性大规模推广并不见动静。譬如有了上海金山区案例,浦东新区也提出了村村修志的目标,但是上海所辖其他区县并没有跟上,在全国范围来看,村村修志仍是零星一些地区在实践。学界于此实践案例的研究不足,大规模推广建议更少。影响大规模推广的原因,有观念层面的、现实层面的,也有制度层面的。

村村修志无法推广,主要面临观念障碍与现实诸多困难。很多人觉得村志编修尤其是村村修志意义不大,这种观念的形成有两个直接因素,一是缺乏文本世界观念。文本世界为人长期忽视,大多数人不注意对生活进行文本记录;二是村缺乏修志传统,大家大脑中无此观念,多数人没有公众历史记录的需求,只有部分人有兴趣。政府层面领导也如此,甚至一些专门的史志办领导也如此。也就是说,这是一项小众化的活动。要将小众化的活动转化为大众化的活动,难度是相当大的。另一种观念障碍,感觉村子过于平淡,没有名人与大事,不值得书写。这是受传统精英史观影响形成的忽视凡人历史观念。公众史学的推广,正是要校正此类过时历史观,提倡村村的历史都值得记录的公众历史观。

史志办领导层面面临的现实与观念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不在职责范围之内。目下编修村志尚无立法规定,村志不属方志条例规定,故而许多地方对村志编修重视不足。二是史志办精力有限。三级志书的编修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省志办缺乏精力来管理乡村志编修,而且管理职责与编纂职责不分,故而史志办三级志书的编修与乡镇志、村志的编修指导要分开来。三是领导的眼界过高。很多人提出村志质量不高问题,这体现的是史志办领导作为阅读者的关注点。这是一个态度、观念、眼光问题,不能因自己的审美高要求而忘记普及低要求,要允许初创阶段乡村志质量不太高。乡村是底层,有村志比没有村志好,不能用县志、市志、省志的高质量来要求乡村志。精品不是一步炼成的,县志编修经历了上千年积淀,才达到较高水平;村志编修工作才30多年,故而一开始不能要求过高,应先普及。事实上,现在好的村志不比县志差,不能因为有无质量村志存在而怕村村修志。

部分领导层面对大面积推广也信心不足。截至2019年7月,全国三级行政区划市区县2844个;截至2019年9月,全国共有村委会54万个。^①如果全国同步推广,一下子要组建近54万支编修团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的确会带来不小的心理压力,有同志主张“村志编修的摊子不宜一下子铺得太开”^②。笔者认为,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大规模村志活动。全国推广村村修志,肯定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这些是发展中的问题。与其长期不修村志没有问题,不如努力开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修出村志来,才能有所成就。事实上,编修中遇到的问题并没有难到无法克服的程度,事前的观念问题靠事中的实践来解决,事前的担忧靠事后结果来改变。执行中,可以先试点,再大面积推广。局部操作中的困难与大面积推广中的困难,没有本质区别。因为空间虽然扩充到全国,但最终的落脚点仍是区县为中心的村村修志编纂活动,具体的执行层面下潜到区县乃至于村一级,基本流程与基本问题难出以上试点经验范围。应该清醒地认

① 参见《2019年3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9年11月5日,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jb/qgsj/2019/201911051006.html>, 2020年8月1日。

② 朱永平:《把村志打造成村民的“传家宝”工程——江苏省张家港市较大规模推进村志编纂的调查》,《黑龙江史志》2017年第12期。

识到,修不修村志,直接的利益主体是村里,不是外地官员。许多已离开村庄的在外乡贤有修志热情,部分村民也有修志热情。政府要意识到,发动村村修志工程,宣扬村村修志思想,便能进一步鼓舞民间修志热情,吸引更多群众参与进来。

首先,村志入法与村村修志列入五年规划,是解决全国性大面积推广的基本路径。笔者主张全面铺开,关注的是村村修志的制度与文化建设。之所以呼唤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与各省出台乡村志编修条例,就是要解决村志编修的制度建设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修志是靠政策的。当下中国乡村志编修最缺的是制度、机制。2006年,才执行《地方志工作条例》。近年,中指办在推动方志立法建设。笔者认为,在方志立法建设中,必须加上乡村志。乡村志入法,已有人在推动,如2016年山东曹恒顺关于修订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的意见,被列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的8368号《建议》,中指办领导也给予正面回应。^①浙江也有颜越虎的“村志入法”建议。^②2007年以后形成的各地地方志工作条例,仅是鼓励部分村修村志。2013—2018年间,河南、湖北、山东、上海4省市下达了乡村志编修专门性办法,明显加快了脚步,实际上在倒逼中指办出台专门性乡村志条例。中指办直接策划《中国名镇志》《中国名村志》两大项目之余,更应下发明确的全国各地修村志条例。除了村志入法,更为重要的可能是编修地方志五年规划。上一轮《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是2015年颁布的,到了2020年,理论上要制订下一轮《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5)》。《上海市乡镇街道村志及专业志编纂规划(2017—2025)》已经率先制定,希望中指办能将村村修志纳入下一轮“全国乡镇街道村志及专业志编纂规划”。如果能将村村修志纳入全国性五年规划,中间由各省市史志办将之纳入各地方志工作五年规划,最后由各区县来执行,纳入各区县五年发展规划,给予财政预算,大事就可搞定。再持续执行5—10年,就可实现全国性的村村修志目标。村志入法与村志规划缺一不可,前者是法律依据,后者是行政框架。此间,列入各县五年发展规划是基本所在,其他执行中的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问题。

其次,要从村志编修软件建设入手。重点修志与村村修志,并不矛盾。由重点修志到村村修志有一个过程,村村修志是重点修志进一步发展的必然形态,执行过程中,二者可同步进行。村志编修质量高低取决于主修队伍配备与管理水平,与是否普及无关。从史志办管理来说,全面铺开后会没有精力来抓。这个问题肯定会存在,但不能因此影响普及。它提醒我们村村修志的执行,更应提升模版、流程的现代化管理,而不是完全靠人工来管理。之所以有人要将之对立起来,完全是建立在人工管理状态上的。如果换成软件之类,用现代网络技术来管理,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村村修志属于大规模文化生产,近于工业化生产思维,所以会更强调标准化、流程化。为什么要实现村志编修的模版化与流程化管理?一是适应外行修志。初修村志之人普遍是外行,要经过培训才可使用。有了编修模版与流程,可以实现在线培训。二是便于互相沟通,修志人员可以及时沟通交流。三是适合动态管理,实现进度、质量的同步管理。村志管理团队、专家团队,可以直接查看,定期指导。如此,建设好一个好用的村志编修软件,是实现全国性村村修志的关键所在。2018年,青岛臧忠卓申请“一种基于云平台的村志采编成稿的一体化系统及其使用方法”专利。据介绍,它解决了现有村志编修难度大、效率低的问题,可在线共享文档,实

① 参见曹恒顺、牛光芝:《将乡村志编修纳入〈地方志工作条例〉》,《人民日报·内部参阅》2016年第24期。

② 参见颜越虎:《着力拓展依法治志的范畴——〈地方志工作条例〉有关条款修订研究》,《黑龙江史志》2018年第8期。

现同步地交流修改，是目前可选的理想村志编修软件。如果能结合更新的模版与流程化要求加以改进，适合面当更宽；如果能与各级史志办建立合作关系，推广应用当更为理想。

结 语

本文尝试阐述村村修志的理由，归纳总结试点成功经验，分析存在的困难，提出解决办法，希望改写大部分村庄“有村无志”的现状。

宋元以来传统中国是一种家国体制，县以下乡村治理靠各姓宗族的自我管理，记录宗族自治的载体是宗谱。进入20世纪50年代，废除了宗族自治体制与宗谱编修，逐步建立了直接的乡村管理体制。在这种情况下，记录百年中国乡村治理与村民活动轨迹的村志，也逐步成为全新的历史文化需求，建立村志记录制度，让各村进入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就成为当下的急务。在近20年中，各地逐步探索出镇级、区县级、地市级，甚至省级村村有简志、村村修详志模式。全国范围内的重点修志，也在进行之中。只是，目前尚处于局部地区村村有志、全国重点村有志的状态。中指办完成了全国性试点阶段，下一步完全可以全面推广。笔者希望取用两者优势，在全国范围实现村村修志的理想。早期部分地区的村村有志，靠的是领导的独具慧眼，上下达成共识，后期靠的是地方志编修条例。依法修志，已在全国达成共识。村村修志也应靠《地方志法》，靠各地的五年规划，来推动此项大业。村村修志是一项复杂的历史文化建设活动，但通过各地的人为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大规模村志编纂的动力源是政府与乡贤，村村修志能够体现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理念，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人为本的色彩。通过村村修志，可以了解各地区乡村发展的历史、深化乡村基层研究，也能够为乡村治理研究培育一支坚强有力的文化队伍。站在公众史学角度看，人人有过往，村村有历史，当代公众的历史值得记录研究，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作为当代公众重要群体，村民的历史值得记录研究。通过考察地方志发展形态可知，“一村一志”是地方志发展的必然形态。通过考察全国多处区县村村修志的实践可知，以区县为单位进行村村修志进行推广是可行的。村村修志，既要在观念上认同，也要建立健全村志编修制度。在解决了观念、制度问题下，剩下以区县为单位的村村修志，主要是由点而面的扩大问题以及各地执行工作的细化与优化问题。村志的编修由名村名镇扩散开来，逐步实现全国性村村修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覆盖。替各村建立村志编修制度是第一价值，留下村志文本是第二价值。如此，各村就进入历史文化建设的良性循环之中。村村修志的价值与意义，很多人事前看不见，但事后能看清，时间越久越会彰显其价值。笔者坚信，村村修志的大规模推广将会为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治理研究交出满意的答卷，贡献一份史学智慧。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周 全